

龔固爾獎得主 艾力克·施密特 與他的「越界書寫」

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聯同法國領事館，於11月8日邀請了法語作家艾力克·埃馬紐埃爾·施密特 (Eric-Emmanuel Schmitt) 主講了一場題為「埃馬紐埃爾·施密特的越界寫作」的講座。除了施密特，講座尚有三位浸大學生列席，分別為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的高敬文教授、陳秀瓊博士，以及任職人文及創作系的本人。施密特於講座上侃侃而談，對他的創作觀、宗教思想、跨文化的身份認同作了深入的闡述。

文：唐睿 圖：HKBU European Studies / French Stream 提供

埃馬紐埃爾·施密特於2010年憑藉《天使記憶的協奏曲》一書，獲得法國文壇最高殊榮——龔固爾獎的短篇小說獎，他的小說作品至今共計有二十多種，大多被譯成多國文字，流通全球。施密特的小說創作成就在法語地區已得到充分肯定，並於今年入選為龔固爾獎評委。除了小說，施密特亦是一位資深劇人，他的戲劇在法國同樣得到高度肯定，並於2001年獲法國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頒發法蘭西學院戲劇大獎。施密特的戲劇曾在五十多個國家上演，其中包括2007年由劇場空間在香港演出的《粉紅天使》。

熱愛哲學與宗教

雖然施密特是法語界炙手可熱的作家，但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所主修的，卻非文學，而是哲學，他的靈感泉源，亦多以哲學為主。當然施密特也有喜歡的法國文學作品和作家——例如普魯斯特，但當被問及誰是他最喜歡的法國作家時，他就二話不說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重要旗手——狄多羅 (Diderot)。施密特的談話裡，引用哲學家的頻率——例如柏拉圖、帕斯卡和柏格森等，絕對要比文學家和文學作品多。基於這種背景，施密特的作品大都帶着一層濃厚的知性美。不過，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施密特的作品大都艱澀難懂，事實上，他的作品恰恰具備了相反的特質，它們明快、清晰、時見幽默，且往往充滿童趣。施密特創作時力求「簡潔」，他指出，作品是「簡潔」抑或「簡陋」乃在於，「簡潔」是了解問題的複雜性，並將其克服；而「簡陋」則是忽視問題的複雜性，而隨便採用最順手的方法去敷衍問題。明白了施密特這個創作理念，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讀者在閱讀《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諾亞的孩子》、《最後十二天的生命之旅》等涉及複雜哲學、宗教、文化、歷史問題的書時，不但不會感到吃力，反而會覺得饒富趣味。

一些讀者可能會好奇，像施密特這樣一位對哲學有着深厚認識的學者、作家，為什麼會對宗教主題感興趣，但施密特卻指出，



《天使記憶的協奏曲》



龔固爾獎得主艾力克·施密特在浸會大學演講。

人類對宗教的興趣，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本能，即使在現代社會，人類對宗教的興趣亦不見得減退。各種宗教都仍在認真看待並嘗試回應許多未有圓滿解釋的問題，它們在人類歷史、文化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就此而言，宗教實在十分值得關注。施密特在作品裡討論宗教，並非以生搬硬套的方式，而是以一種哲學寓言的筆法來處理，這種手法，正

正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作家，例如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狄多羅等人所擅長的，而這些作家跟施密特一樣，一方面對哲學有着深厚認識，同時又妙筆生花，極富想像力和幽默感。施密特作品談宗教，並不像一些固步自封的哲學家，以一副唯我獨尊的方式去談，而是以一種開放、睿智且充滿辯證的方式去談。例如在《諾亞的孩子》裡，當猶太小孩約瑟夫向彭斯神父詢問，到底猶太教和基督教哪一套主張才是正確的時候，彭斯神父就這樣回答：「你恐怕很想知道在這兩個宗教中，哪一個是真的吧。然而，哪個都不是！沒有哪個宗教是真的或是假的，它只是

提出一種生活方式而已。」這種開放、辯證，甚至致於挑戰傳統說辭的態度，恰恰也就是法國啟蒙主義作家都肯定的態度。

呈現啟蒙主義精神

施密特的視野非常開闊，他的作品並不囿於西方的傳統文化歷史素材，而能夠觸及到猶太文化、伊斯蘭教、無神論……劇作《密勒日巴》就以藏傳佛教為主題，而《長不胖的相撲手》就以日本文化為素材。曾有人問施密特，他既不是佛教徒，為什麼要以佛教為題材，當時施密特回答說，儘管自己不是佛教徒，但不見得就不能思考佛教的問題。的確，男性亦有權支持女性主義，天主教神父彭斯，亦可以在《諾亞的孩子》裡同情猶太人，保護猶太會堂的文化遺產，並向猶太小孩約瑟夫傳授希伯來文。在施密特的作品裡，不時都能看到彼此欣賞、羨慕乃至渴望得到對方身份的角色，這些角色說明施密特的作品充滿了開明、開放的啟蒙主義精神。在施密特的信念之中，各種文化、宗教都是平等且能夠彼此對話，展現著強烈的世界主義精神。

施密特的作品往往都充滿童趣，而且有不少作品都是由兒童的敘述觀點出發。施密特說：「柏拉圖認為，兒童是最優秀的哲學家，因為他們好奇，經常詢問原因。」而事實上，施密特也是一位充滿好奇心，而且不住藉著作品，去提問各種問題的「孩子」。

書介

圖文：草草

The Sellout

作者：Paul Beatty
出版：Picador USA

2016年曼布克獎得主！作為首位獲獎的美國作者，Paul Beatty用諷刺的筆調直指種族與政治禁忌等當代議題。「就像在擠滿了人的劇院大喊『失火了！』，Paul Beatty在一個後種族主義的時代耳語著：種族主義」——小說The Sellout將故事場景設於美國洛杉磯，也就是現在正因警察對非裔美國人過度執法而引發大規模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的城市，主角是非裔美籍的農人，卻試圖將奴隸制度重新落實於現代社會。書評家說：作者「一邊把你釘上十字架，還一邊搔你癢，這部屬於當代議題的小說，充滿了極為少見、可媲美馬克·吐溫《湯姆歷險記》與強納森·史威夫特《格列佛遊記》的機智幽默。」

The Truth about Trump

作者：Michael D'Antonio
出版：Thomas Dunne Books

普立茲獎得主 Michael D'Antonio 發表最真實的特朗普傳記，截取十年來獨家專訪及研究資料，從他如何開始從商致富，到勇往直前不與爭議走進神聖的白宮殿堂。作者列出特朗普的成功與失敗，醜聞及勝利，及其如何憑藉追求金錢與名聲的驚人毅力而達到今日的成就。作者更詳盡介紹特朗普家庭的財力背景，他如何在政治上一路領先，及如何善加利用媒體力量將曝光度轉化為成功的力量。本書初版於2015年，現在再版，內容再度更新特朗普在政治生涯的崛起之路。

莎拉·賀 穿梭中英兩地文化的詩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添浚）日前，香港出生、擁有半中半英血統的英籍詩人莎拉·賀帶著她獲詩歌界最高榮譽艾略特獎的詩集《Loop of Jade》（玉環），走進香港大學「第二世紀講座系列」講堂，細訴她回港尋根、穿梭中英兩地文化的故事，探索身份與地方及移居的關係。



英國詩人莎拉·賀 (Sarah Howe) 陳添浚 攝

《Loop of Jade》，顧名思義，是指中國傳統玉手鐲。據莎拉說，翡翠色的玉鐲原意是用來庇護蹣跚行走的嬰兒。當嬰兒失去平衡倒地時，玉鐲會比嬰兒先著地碎裂，「以身相救」。而就莎拉個人來說，玉鐲與她的母親、她的出生地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由長繩穿過、掛在她脖子上的玉鐲，是她母親在她出生不久後送給她的。玉鐲一方面代表了她和母親間母女之情，另一方面代表了莎拉作為生於香港、童年時曾在香港生活過七年的半個中國人，對中國傳統信仰和香港作為她「故土」的連繫。

在莎拉看來，華人社會的母女情並不如想像般理所當然，她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她的母親出生於廣東，是一個棄嬰，後來被香港一個貧窮家庭收養。在《Tame》（馴服）一詩中，她引用了一句流傳於中國民間的俗語「養鵝之利，大過養女」，批判華人社會「重男輕女」的現象。詩集中另一首詩《Crossing from Guangdong》（橫渡廣東），寫的正是莎拉十七歲時重遊當年她母親被遺棄後從廣東被帶到香港的一段路。這一次「朝聖之旅」，也呼應了她詩集書名中的「Loop」（循環）。她和母親屬於兩個不同世代的聲音，透過相同的旅途，交疊在一起，就像命運的一個循環。

對於自己中國人的根，莎拉的態度是若即若離的。她不懂廣東話，否定「重男輕女」，對於兒時在香港生活的印象也很模糊。然而，她也未能完全投入自己英國人的身份。「雖然小時候英裔父親經常給我灌輸英國是我祖家的概念，但我根本沒去過英國，英國更像是一個『想像之地』，反而香港更像是我的故土。」這種身份上的矛盾有時直接反映在她的日常生活中。莎拉說：「街上有些人以為我是純種白人，也有些人以為我是地道的華人，後者很驚訝我完全不會說廣東話。」

莎拉並沒有因為這種矛盾而自憐自憫。反之，她認為她與生俱來的「混雜性」很貼合詩性的語言，是她創作上的優勢。她坦言，詩歌比起散文更碎片化、更抽象，意義捉摸不定，這和她飄泊的人生經歷和猶豫不決的身份認同有幾分相似。看來，和很多藝術家一樣，不平凡的人生閱歷造就了莎拉不平凡的作品。

為什麼要重讀 《童年的我，少年的我》

書評
文：李夢

最近，適逢山邊出版社創立三十五周年，該社創辦人何紫的散文集《童年的我》與《少年的我》合併再版。兩本散文集均曾獲獎，前者入選1991年「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後者獲得第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在我看來，何紫的散文時至今日仍為坊間談論不息，並非因為這些獎項，而是因為書中那種「苦中作樂」的生活態度，不論對於順境或逆境中的人，都是某種慰藉與鼓舞。

林海音是何紫推崇的兒童文學作家，而她的《城南舊事》與何紫的《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很有些相似的地方。這兩部書都是從孩童視角出發，觀察某段特殊年月的世事與人情。林海音寫的是北京，何紫寫香港，一北一南，風俗口音與生活習慣各有不同，卻都曾經歷戰亂與動盪。越是在曲折顛沛的年月，越能見出人心的美善與醜惡。小孩子看世界的眼光相對純真，自然能將四圍風景中的光明與晦暗辨得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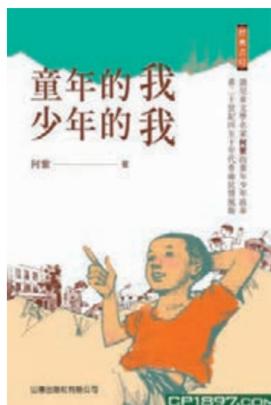
要說何紫書中最令我反思人性的一段，要屬《修頓球場的神秘》一文中提到的「波地」耍猴戲老伯的故事。當年，每逢入夜時分，白天踢波的人散了去，修頓球場那一大片空地便成了說書人、手藝人和小商小販常出沒的地方。有一次，何紫與一群小夥伴正看猴戲看得入神，忽然幾個壯漢圍過來，將耍猴老伯趕走了。小夥伴替老漢忿忿不平，還被那群人高馬大的莽漢打了一通。

何紫一直記得這件十足委屈的事，不單因為小夥伴挨了打，還因為在社會環境混亂、秩序有待重建

的年代，當黑惡勢力滋生的時候，百姓雖有怨言，卻也只能聽之任之。若不是因為這書，生活在如今的我們，恐怕仍將當年發生在此城中的、與戰爭和罪案有關的往事，當作傳奇故事來聽。正如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說的那樣，何紫的童年故事裡，「跳動著歷史的脈搏」。

如果說《城南舊事》字裡行間都透出些憂鬱以及小女孩特有的細膩敏感，那麼《童年的我，少年的我》中的何紫，則完全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男子漢模樣。自己原本膽子就大，與幾個小夥伴同行時，愈發肆無忌憚，什麼險地都敢闖，為此沒少受母親責罰。我很喜歡書中那種樸拙的、大咧咧的筆調。為聲援猴戲老伯被壞人追打，在書院花園中掘出頭蓋骨，又或一邊食安樂園紅豆雪糕一邊在植物園探險……這種無畏甚至生猛的生命態度，在如今的孩子中間，恐怕再也容易找到了。雖說科技便利了，智能手機或iPad上的遊戲多到數不盡，可如今的孩子在讀到何紫書中那些異時空中發生的尋寶或歷險經歷，會否也心生嚮往呢？

書中那些談論吃食的文字，同樣令我印象深刻。在《一天五角》一文中，何紫憶及小時候每日零用錢共有五角，一角早餐，三角午餐，另外一角存下來買些零食或小玩具。他當年在英皇書院附近讀書，課後常去水街午餐。那年代的午餐種類豐富，



《童年的我，少年的我》

作者：何紫
出版：山邊出版社

有艇仔粥、芽菜炒麵條、墨西哥包和牛奶雪條等等，隨意搭配，若用心揀選，每日用餐時都是一番愉悅體驗。反觀如今快餐店，餐牌名字簡化為ABC幾個字母，多少失了些趣味與溫情。

今人愛懷舊，或許覺得如今日子壓力大，匆忙又無趣，才會想念當年單純樸拙的美好。放大來說，何紫書中所寫並非他一人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回憶，而是香港這座城市在1940至1950年代社會風貌的記錄。透過這些文字，我們了解到戰亂之後至經濟起飛之前的歲月中，人們如何娛樂飲食，如何度過那些並不寬裕卻相當快活的時日。

似乎，一切地方的發展總不免帶來舊有鄉土文明的某種失落，而這失落，從樂觀的視角看，反而應成為如今人們過日子的情感支撐。每每當我們懷念時，除了安樂園雪條和修頓球場的夜市，也不該忘記當年此城中人堅韌努力的生活姿態。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 或 bookwvp@gmail.com